

# 五四運動健將

## 羅家倫與中大

● 何善川

(本文插圖刊第八頁)

### 執掌中大十年校政

國立中央大學，民國時期作為首都大學，「冠全國中心之學府，樹首都聲教之規模」，其在全國各類高校中的地位和影響，當可想見，因而管理也實屬不易。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廿一年間，該校校長八易其人，一般在任均一年左右，而獨羅家倫先生，執掌十年校政。在當時國難當頭、戰禍頻仍的艱苦條件下，羅家倫憑著執著的信念和堅韌的毅力，使得中大獲得較大發展。

羅家倫與中大

羅家倫（一八九七—一九六九）字志希，浙江紹興人。一九一四年就讀於上海復旦公學。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。在北大求學期間，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，鼓吹自由民主，與傅斯年等共同創辦的《新潮》雜誌，成為當時繼《新青年》之後，倡導新文化運動的第二種最有影響的刊物。「五四」那天，北京十三所學校三千多人的大遊行，羅家倫一直走在隊伍的前列，並被推為代表之一，到美、英、法、意等國使館，遞送說帖和意見書，希望各國給以「同情之援助」。

「五四」那天所散發的唯一一份印刷品《北京學界全體宣言》傳單，就是羅家倫起草的，宣言主張「開國民大會，外爭主權，內除國賊」，斷然表明：「中國的土產，可以征服，而不可以斷送」，「中國的人民，可以殺戮，而不可以低頭」。宣言雖只有一八〇多字，卻寫得大氣磅礴，字字鏗鏘，極富號召力。二十三天之後，亦即五月廿六日，羅家倫以「毅」為筆名，在《每周評論》第廿三期「山東問題」欄內，發表了一篇短文，題為《五四運動的精神》，第一次提出了「五四運動」這一重要概念。它的意義不在於名詞的推敲，而在於將「五四」這一事件，作為一場醞釀已久的民族自決運動。這位「五四」運動的健將，直到晚年，對於「五四」的激情和稱道，始終未衰。

一九五〇年「五四」卅一周年之際，羅家倫在台北《中央日報》上發表「五四真精神」一文，仍舊強調「五四」是文化意識的覺醒，是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，「它是以愛護國家民族為骨幹的」，「無論你贊成五四也好，反對五四也好，五四在中國近代史上自有其劃時代的地位」。

### 改制清大歸教育部

一九二〇年秋，羅家倫獲得上海工商界巨子穆藕初資助留美，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先後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、哥倫比亞大學、英國倫敦大學、德國柏林大學和法國巴黎大學研讀歷史、哲學。一九二六年回國出任東南大學（中央大學前身）教授，隨後參加北伐，加入國民黨，曾做過蔣介石的秘書，中央黨務學校教務主任和代理教育長等職。

一九二八年「五·三」濟南慘案發生，國民黨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長蔡公時等，在負責交涉時，被日軍挖眼割耳殘殺，時為該會教育處長的羅家倫，受蔣介石委派，與熊式輝一道，涉險調查，嚴責日軍，其膽識頗受國民黨上層所賞識。三個月後，時年卅一歲的羅家倫被派為國立清華大學的首任校長。

當羅家倫帶著一腔熱血和勃勃雄心，準備在清華大幹一番的時候，中原大戰爆發，閻錫山的勢力控制了華北，閻系人物提出「清華人管清華」的口號，校園裡掀起「驅羅運動」，羅家倫被



① 民四十九年羅家倫（左）陪何應欽（左二）參閱國民黨史料。  
② 羅家倫（前左）偕夫人（前右）與家人合影。

迫辭職。儘管如此，在不到二年的時間裡，羅家倫對清華所作出的成績，依舊是令人矚目的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使清華改歸教育部，而不再受外交部的牽制。當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導師陳寅恪先生，談到這點時說：「志希在清華，把清華正式的成爲一座國立大學，功德是很高的。」

## 發展中大教育事業

羅家倫離開清華後，曾受聘爲武漢大學教授。一九三二年八月，羅家倫被任命爲國立中央大學校長。當時的中大正處於動亂之中，先是易名風潮，一九二七年六月到一九二八年四月，十個月內，四易校名，先後經歷了東南大學、第四中山大學、江蘇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。隨後又是易長風潮，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，兩年不到，七易校長（含代理及未到任），最後只得由國民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，成立中大整理委員會，由蔡元培任委員長，當時的羅家倫是委員之一，後不到兩個月，整理委員會解散，由羅家倫出長中大，至此，這場易長風潮遂告平息。

有鑒於困難當頭，作爲首都大學，應當對國家和民族盡到特殊的責任和使命，所以羅家倫上任伊始，在對全校師生作的《中央大學之使命》的講演中，就提出建立「有機體的民族文化」，這種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結晶，也是民族團結圖存的基礎，決心把中大辦成一所兼容並蓄的大學，就像十九世紀初的柏林大學一樣，肩負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責任。而要做到這一點，就必先養成

一種良好的學風，於是他進一步提出了「減漢雄偉」的新學風，勉勵中大人對於「學問事業應當一本誠心去做，人與人之間以誠相見，樹立崇實而用笨功的樸厚學術氣象，以大雄無畏相尚，挽轉纖細文弱的頹風，以造成一種偉大崇高的意境。如此這般，中大便可以爲復興民族的參謀本部自任。」與此同時，羅家倫又提出安定、充實、發展三時期治校方略，在安定中求充實，在充實時求發展。這樣，中大於易長風潮之後，遂進入了一個穩步發展時期。其學科建設方面，中大有文、理、法、教育、工、農、醫、商八個學院，自中大整理委員會決定把地處上海的商醫兩院劃出獨立後，南京僅存六個學院，羅家倫根據社會急需和學科發展趨勢，對中大的系科設置，不斷地進行調整和擴充，一九三五年再度創辦醫學院，使中大成爲當時學科最爲廣泛、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，擁有七個學院，卅多個系科，其系科之多，位居全國之首。在教學科研方面，羅家倫多方延攬人才，注重教授專任。一九三三年八月，中大僅理學院就新聘了十多位著名學者擔任教授。一九三四年，專任教師的課目已占四分之三，確保了師資隊伍的穩定和教學質量的提高。

同時，提倡教研，鼓勵辦刊，先後出版了《文藝叢刊》、《教育叢刊》、《農學叢刊》和《社會科學叢刊》等一系列有影響的雜誌，一時間，學者名流雲集中大，科研氣氛隆盛，聲譽鵲起。在改善辦學條件方面，羅家倫上任之後，擴建了學生宿舍，重修了生物館、東南院和南高院，加建了圖書館，不僅使閱覽室的面積擴大了四倍，而

且書庫的容量也增加了一倍半。同時，圖書雜誌數量也大有增加，據統計，一九三二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，中大大共購置圖書計中文書六三三八二冊，西文書三四八二八冊；中文雜誌二八六種，西文雜誌二二三種。這一切都有力地推動了中大教育事業的發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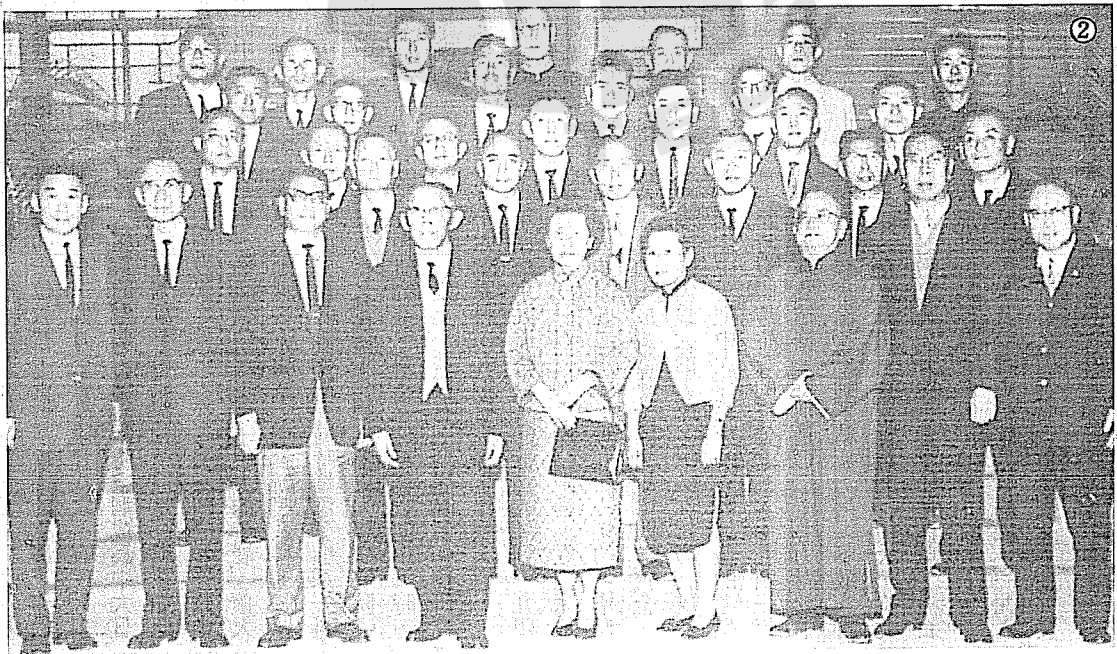
## 石子崗畔玫瑰甜夢

一九三四年，羅家倫認爲「中大發展的時期」到了。當時的中大逼處都市中心，四面環街，車馬喧囂，不宜研討學問，薰陶身心，校部面積僅三〇〇多畝，湫隘狹窄，實無發展餘地，且師生食宿，雜處市井，難以溝通；教學試驗，分散隔離，極不經濟，處處都障礙著中大的發展。於是，羅家倫打定主意，另覓新校址，要把中大建成一個能容納五千到一萬學生的真正首都大學，同時也實現他的「一個玫瑰色的甜夢」。羅家倫的設想，在他多方奔走努力下，不僅得到了當時教育部長王世杰的贊成，而且也贏得了蔣介石的首肯。於是，一九三四年一月，國民黨的四中全會上便通過了「建立中大新校址」的提案，建築費暫定二四〇萬，並由行政院一九三三年度按月撥付遷校建築費八萬元。隨後，羅家倫派人四方勘探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，終於選定了中華門外的石子崗一帶，作爲新校址，該處北對巍巍紫金，南連蔥鬱牛首，東倚天印方山，西眺滾滾長江，山陵起伏，曲折有致，林木茂盛，風景極佳，而且交通便利，與首都各文化學術機構，仍可收彼此合作之效，實在是從事與學術研究的理想場



①一九三二年任中大校長時的羅家倫。

②一九六六年羅家倫（前排右六）與國史館同事們合影。





所。後來羅家倫曾作過一首《憶南京》，抒發了他內心的美好嚮往與懷念：

我又想到了雨花台南，

尚名石子，橋喚鐵心。

南望牛首，

東望方山，北望紫金。

山頭放眼望呵，

大江雄渾，秦淮澄清。

這一水三山之間，

正是理想的學術都城！

新校址選好後，羅家倫懸賞五千元，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圖案設計招標，經公開評定後，由興業建築公司繪圖承建，共圈地八千多畝，預計卅個月完成。倘真如願，中大必將成爲一個「環境優美、格局軒昂的全國最大的近代式大學」，正如羅家倫自己所認爲的：「本校是否能成爲國家完善之學府，當視新校址是否建築遷移而定。」可是，就在新校址動工還不到兩個月的時候，盧溝橋的槍聲響了。

### 力排衆議西遷重慶

全面抗戰的爆發，南京政局的危殆，不僅使得中大城的建設嘎然中止，而且遷校的問題，又逼呈眼前。當時敵機轟炸頻繁，中大圖書館、實驗中學、大禮堂和牙醫專科學校都遭到了破壞，羅家倫在大禮堂的辦公室也被炸得面目全非。在這種情勢下，羅家倫即刻召開教授會，議決兵分三路，分赴重慶、兩湖和成都，另覓新校址，最後考慮到重慶不僅是戰時大後方的中心，而且地

勢複雜險要，宜于防空和固守，在那裡建校可以獲得相對持久的穩定，所以，羅家倫力排衆議，決定西遷重慶。其後的事實證明，他的果斷決策是合乎時宜的。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三日，教育部准予中大西遷。可以想見，整所大學的千里大遷徙，其工作是極爲艱巨繁雜的。當時南北各大學在遷移過程中，都備嘗艱辛，損失嚴重，而中央大學一舉西遷重慶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，就在重慶開學復課，八年抗戰中，教學從未間斷，損失最小，秩序最爲穩定，這在當時全國高校中，確是絕無僅有的奇跡。西遷後的中大分爲四個部分：重慶沙坪壩本部、柏溪分校、成都醫學院和貴陽實驗學校，其中沙坪壩本部松林坡，僅是一個小山丘，緊鄰重慶大學，占地不足二百畝，爲了能保證中大迅速復課，整個校舍工程，僅用了四十二天時間，就建起了一排排低矮的教室和簡陋的宿舍。入川后第二年，學生人數激增，羅家倫又爭取到沿嘉陵江而上的柏溪，建立分校，突擊二個月，建起了四十四幢校舍。一九四一年羅家倫在離開中大時的告別演說中，曾不無幽默地說：「造化的安排，真是富於諷刺性。我在南京沒有造成大規模的新校址，但這點領至局部而未用完的餘款，竟使我在兵荒馬亂的年頭，在重慶沙坪壩和柏溪兩處造成兩個小規模的新校舍，使數千青年，沒有耽誤學業，真可以說（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）了。」

### 炸彈下長大的中大

西遷後的中大，時常受到敵機的襲擾，沙坪

壩的圖書館、校舍，成都醫學院等都曾遭到破壞。森林系的一位教授，曾對沙坪壩的空襲，作過詳細統計，有一個月空襲高達廿八次，有一天多達五次。頻繁的空襲，使得鑛防空洞成爲中大大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但是，就在如此簡陋困頓的教學條件下，在呼嘯不斷的炸彈聲中，校長羅家倫繼續執著地謀求中大的發展，擴大辦學規模，延聘名流學者，增設新興系科，將原教育學院調整爲師範學院，同時增添了七系一科，一九三八年又創辦了「國立中央大學研究院」，分設九個研究部。在羅家倫最後離開中大時，中大在學科建設上，共擁有七個學院，一個研究院，五十六個系科，九個研究部；學生人數，一九三八年在南京註冊時爲一〇七二人，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增爲三二五三人；所開課程，在南京最後一學年，共開五二四種，一九四一年的下學期則爲八二九種，成爲當時全國高校中門類齊全、院系衆多、規模最大的大學，以致在抗戰初幾年的統一招生中，把中大作爲第一志願填報的考生，曾占當時全國考生數的三分之一。一九四一年八月，由於經費拮据，特別是CC派勢力對於中大的滲透，羅家倫「已到了精疲力竭，不敢支撐的地步」，被迫辭職。羅家倫離開了中大，從此也就離開了教育界。其後擔任了一些閑職，赴台後，曾歷任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，「考試院副院長」及「國史館館長」等職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五日，因肺炎及血管硬化等症并發，病逝於台北，年七十三歲。（摘自民國春秋雙月刊。周鴻特推介。小標題爲編者所加）